上图：把《温故一九四二》改成电影，刘震云花费了前所未有的力气。

关系。小说和电影，编剧和原创，在刘震云这里没有太多矛盾，水乳相融彼此促进。从《一腔废话》到《手机》，《我叫刘跃进》到《一句顶一万句》，《我不是潘金莲》到《吃瓜时代的儿女们》，刘震云暂别“故乡系列”，开始启动“说话系列”的写作。

评论家李丹梦说：“《手机》热卖后，‘小说+电影’的跨界操作、双轨运行模式基本在刘震云的创作（包括构思、书写、宣传、推广等）中固定下来。与之相应的是，他对幽默的运用与书写手段，包括‘不是……而是’的缠绕叙述，也日趋风格化。这是刘震云对和平岁月大众趣味、日常审美的创造性满足与贡献。”

《手机》之后，刘震云以差不多三年一部的速度，编剧了不少影视剧作品。到目前为止，《温故一九四二》是刘震云的唯一非虚构作品。1990年，《唐山大地震》的作者钱钢在《中国减灾报》工作，他当时打算编一部《二十世纪中国重灾百录》，他把“1942年河南大旱”的撰写任务交给了刘震云。选择刘震云的原因很简单，刘震云是河南人，写这个题材合适。这部调查作品完成后，便是《温故一九四二》。一个关于饥饿的历史“故事”，却有着“非虚构”的外观，最后以中篇小说的名义刊发，后来荣获了《中华文学选刊》优秀中篇小说奖。1942年的河南大旱，三千万河南灾民成了蒋介石与日军相互拉锯的牺牲品。小说通过“劫后余证”的“我姥娘”“我花爪舅舅”的回忆，美国《时代周刊》记者白修德的考察以及各种报章的记录，还原了一段惨痛的故乡灾难史。

对刘震云来说，电影《温故一九四二》启封、接通的不仅是他与故乡的历史，与灾民、流民的血脉、亲缘，还有故乡河南的千年创伤。把这部作品改成电影，刘震云花费了前所未有的力气。电影以1942年河南大旱，千百万民众离乡背井、外出逃荒的历史事件为背景，分两条线索展开叙述：一条是逃荒路上的民众，主要以老东家范殿元和佃户瞎鹿两个家庭为核心；另一条是国民党政府，他们的冷漠和腐败、他们对人民的蔑视，推动和加深了这场灾难。“当编剧是比作家还困难的职业。作家写作一个人说了算，编剧写作很多人说了算。这样的创作不像写小说那么自由自主；另外，电影受时间的限制。90分钟到2个多小时，要完整表达故事，塑造人物形象，心路历程，比小说难。因为小说可长可短，不受篇幅的影响，可以自由地写。”刘震云说。